



第一部分

跨国新闻史研究

心灵停滞的“异教徒”

——十九世纪晚期上海英文外报中国国民性知识话语生产初探

谢庆立

摘 要 十九世纪在华外报生产的中国国民性知识话语，已成为西方理解中国的一种文化资源。学界相关研究多集中在中国形象、思想史和新闻学层面，而在华外报生产的中国国民性知识话语被其他方面的研究所遮蔽。十九世纪在华外报生产的中国国民性知识话语，既是将近代西方观念中的中国形象转化为具象化存在的一种方式，也刺激了近代中国“改造国民性”的文化自觉。本文聚焦十九世纪后期在上海出版的《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晋源西报》(*Shanghai Courier and China Gazette*)与《上海文汇报》(*The Shanghai Mercury*)英文外报，以其有关“中国国民性”的评论与报道为研究对象，考察英文外报中国国民性知识话语的生产机制，梳理与分析这种知识话语所呈现的媒介图景，探究这种知识话语生产的内在逻辑、价值立场等问题。研究发现，英文外报有关“中国国民性”知识话语的生产，自始至终基于西方的价值立场，显示生产者视西方为中心的文化优越感。本文认为，上海英文外报中国国民性知识话语的生产过程，其实是赋予西方改造中国“合理化”内涵的过程，以传教士为代表的“中国国民性”知识话语生产主体，其动机是以基督教价值改造中国文化，继而在中国确立以西方价值为主导的文化秩序。

关键词 上海英文外报；中国国民性；知识话语

自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纪录报》《中国信使报》《中国丛报》等英文外报相继在澳门、广州出版,这些报纸生产的中国国民性知识话语,把西方观念中的中国形象转化为具象化的感性存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上海成了西方外报的出版中心,之后在此出版的《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晋源西报》(*Shanghai Courier and China Gazette*)与《上海文汇报》(*The Shanghai Mercury*)等英文外报,围绕中国国民性议题展开评论与报道,持续关注中国国民性问题。到十九世纪末,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字林西报》“中国人的气质”专栏发表系列文章,此后又把这些文章以“中国人的气质”为题结集成书,在西方以多种文字出版,标志着在华英文外报中国国民性知识话语生产达到一个新阶段。作为西方认知中国的一种知识话语,外报所生产的中国国民性逐渐成为西方理解中国的知识资源,以后也成为近代中国文化自觉的一种思想资源。学界的相关研究多集中在中国形象、思想史和新闻学层面,近代西方在华外报与中国国民性知识话语生产这一突出问题,被学界其他方面的研究所遮蔽,相关研究成果鲜见。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一方面可以更加清晰地廓清近代西方中国形象的知识来源,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把握清末民初中国知识界“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源流及其历史脉络。基于此,本文从大众媒介与知识话语生产的视角,考察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英文外报中国国民性知识话语生产的运作机制,梳理和分析中国国民性知识话语所呈现的媒介图景,探究中国国民性知识话语生产的内在逻辑、价值立场和这一知识话语所产生的影响等问题。

一、运作机制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香港作为在华外报出版中心地的地位被上海取代。以英文报刊为例,1850年《北华捷报》出版后的9年内,上海英文报刊只有3种,而在同一时期,香港新出版的英文报刊有8种。1861年后的30余年,香港与上海的英文外报出版数量出现了反差:这一时期,香港出

版英文报刊 8 种，而上海出版 31 种，占全国英文报刊出版总量的 55% 以上（“以中文报刊论，在 1861—1894 年间，香港新增 3 种，而上海新增 31 种，超过香港的 10 倍，且占全国中文报刊总数的 57% 以上”^①），通过以上对比可以发现，上海已成为辐射全国的现代报刊传播中心，而“与香港相比，上海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地处长江和东南沿海的交汇点上，经海上可以与沿海南北各港口交流，由长江溯流而上，又有广阔的腹地，可以与长江流域 100 多万平方公里的城市和乡村取得联系”。^②

当时影响较大的英文外报有《字林西报》《晋源日报》《上海文汇报》等。1864 年 7 月 1 日，《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在上海租界内出版。该报得到了英国领事馆和租界工部局的支持。这份英文日报的出现，顺应了上海这个新兴商业都市的资讯需求。该报周一至周六每日出版，夜间印刷，清晨发行。出版初期，该报没有设置明确的栏目，经常刊登的内容有新闻、评论、文艺、读者来信、广告 5 大类内容。新闻一般刊登上海及其周边的社会新闻、中外冲突和中外交涉方面的新闻资讯；评论常常针对新闻进行评述和分析；文艺则刊登上海租界的文艺活动资讯。同时，该报还集中发表探讨中国问题的随笔。一些读者来信很有新闻性，对上海租界和中国其他地方的社会问题较为关注。《字林西报》新闻报道来源很广，得益于新闻信息网络的建立。除专门记者外，该报还利用沿海城市的侨民和深入内地的传教士作为通讯员，“《字林西报》馆在各内地省份如青海、甘肃、新疆、四川、云南等边远地区均设有通讯员，1872 年路透社在上海建立远东分社后，又一度获得独享该社电讯的特权，因而在新闻报道方面远远胜过国内出版的其他报刊”。^③ 英文报纸的读者是西方在华侨民，“报纸关于中国事务的报道、评论直接影响外国人眼里的中国形象”。^④

作为一张晨报，《字林西报》报道的新闻只能是昨天以前的新闻。在时效性方面，该报无法满足读者对当日新闻的渴求，所以在上海这样的新

① 方汉奇.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305.

② 陈冠兰. 近代中国的租界与新闻传播 [M].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5: 45.

③ 方汉奇.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309.

④ 王敏. 上海报人社会生活 [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8: 89.

兴都市，晚报的出版就很有必要。1868年，英国人休朗在上海创办了《上海英文晚报》(*Shanghai Evening Courier*)，1873年6月，葡萄牙人陆睿罗(Da Corta)创办了《政风西报》(*Evening Gazette*)。1875年，曾当过《字林西报》主编的英国记者巴尔福(Frederic Henry Baifovr)把以上两种报纸合并出版，改名为《晋源西报》(*Shanghai Courier and China Gazette*)。在内容定位上，《晋源西报》与英国官方保持距离，贴近西方在华侨民的新闻需求进行报道，上海租界出现的问题常常为该报所关注，其报道与评论风格平易近人。英文《上海文汇报》(*The Shanghai Mercury*)1879年由英国商人克拉克(John D. Clark)创办，该报出版后很快成为《晋源西报》的竞争对手。十九世纪后期在上海租界出现的外报，对中国问题的评论一直存在偏见，“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影响身处伦敦、巴黎和华盛顿的高层人士制定与上海租界息息相关的决策”。^①

上海英文外报如何进行中国国民性知识话语的生产？目前直接的相关的资料并不多见，但我们可通过栏目设置、版面安排、有关议题与刊登的文章内容，以及所涉及的编辑、作者和读者等媒介元素，间接获知上海英文外报知识话语生产的相关信息。

与传教士办的中文报刊有所不同，上海英文外报的运作机制较为成熟。当时，《字林西报》《晋源日报》《上海文汇报》都拥有专门的编采人员、稳定的作者队伍以及相对稳定的发行量和读者群。商业性广告收入已成为报纸运营经费的主要来源，基本能够保证报纸的连续出版。而相对稳定的编辑队伍和作者队伍，又保证了新闻信息的及时生产和适时传播。上海英文外报的读者定位很明确，主要把西方侨民及其对象国读者作为接收对象，满足他们对于中国新闻资讯的需求。进入新闻生产环节，编辑着眼于多元矛盾交织的租界生活和乡村社会，为报纸寻找新闻素材和评论话题，同时以“通讯员”为触角，又把报道的视野拓展到中国内陆各省。报纸编辑不仅注意刊登有关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新闻资讯，还常常依托相关新闻设置媒介议题，吸引西方侨民参与对如何改造中国人生活习性、如何提高中国人

^① [英] 保罗·法兰奇. 镜里看中国 [M]. 张强, 译.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社, 2011: 57.

素质等问题的讨论。同时，编辑也常常鼓励读者发表不同意见。这样，上海英文外报有关中国国民性知识话语的生产不是单独进行的，一般是与报纸新闻资讯的生产与传播交织在一起的。因此，稳定的媒介运行机制，很大程度上还得益于以报纸为生产平台的读者参与，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新闻资讯的丰富性和相关的中国国民性知识话语的鲜活性。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报纸还通过通讯员队伍，收集中国内地的有关中国国民性问题的新闻资讯，并把这些资讯纳入报道和评论的范畴，多层面地生产中国国民性知识话语。以《字林西报》为例，参与写稿的通讯员有外交官、商人、传教士，也有租界的管理人员、治安人员和一般侨民。他们常以自发投稿的方式，为报纸提供信息，或针对某些问题讨论发表意见。

相关的报纸栏目设置，对于中国国民性知识话语的生产而言，既是生产平台，又能起到知识话语生产的引导、示范效应。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三家报纸都开设“读者之声”栏目，让读者参与中国人问题的讨论，以吸引读者提供稿件。据统计，1876—1879年《字林西报》“读者之声”共刊发760篇稿件，参与的作者先后有290余人；同期，《晋源西报》共刊登437篇稿件，参与的作者有279人；1879年的《上海文汇报》仅8个月就刊登读者来稿121篇，作者有80多人。其来稿量之大，读者中“通讯员”之多，是近代在华外报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在读者通讯员参与的栏目中，租界侨民生活质量、华人劣根性、租界华人习性的改造被长期关注和讨论，这些无疑是报纸编辑精心设计的媒介议题。为深入讨论这些问题，有的报纸还设专门通讯员深入中国乡村进行考察，譬如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76—1879年，中国北方一些地区发生大饥荒，李提摩太以传教士身份，深入山西、陕西和山东农村采访，为这些报纸撰写大量的独家报道。1872年来华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担任《字林西报》通讯员，他利用在天津、鲁西北传教的机会，广泛考察研究中国农村社会，为《字林西报》等报纸撰写新闻稿件。

1876—1879年《字林西报》《上海文汇报》《晋源西报》刊登的1300余篇文章中，涉及中国人话题的文章就有370篇，占四分之一还多，其主

题内涵极为丰富，涉及社会变迁与文化冲突中的华人教育、行为规范、道德价值，以及中国民族性改造等问题。1888年2月至1889年8月，《字林西报》专门为明恩溥开辟“中国国民性”栏目，这个栏目以探寻文化、政治和社会情景与中国国民性问题为主旨，先后刊登《面子》《勤劳》《拐弯抹角的才能》《礼节》《神经麻木》《漠视精准》《节俭》《仁慈》《漠视时间》《灵活的固执》《误解的才能》《多神论、泛神论和无神论》《保守》《智力混沌》《缺乏公共精神》《中国人的生命力》等30多篇专题文章，多层次地报道中国国民性问题。历时性观之，从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广州纪录报》《中国丛报》等英文外报对中国国民性的讨论，到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字林西报》《上海文汇报》《晋源西报》等英文外报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究，上海英文外报有关“中国国民性”知识话语的生产，无论在生产规模方面，还是在知识话语的系统性方面都达到了新的高度。

二、媒介图景

中国历史悠久，地域广大，人口众多，风俗民情千差万别，对西方在华大众媒介而言，全面建构中国国民性，并纳入知识话语的生产，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明恩溥主张从三个维度勾勒“中国国民性”面貌：“他与其同胞的关系如何？他与自己的关系如何？他与其崇拜对象的关系如何？通过这三点，中国国民性立体图像就会被描绘出了”。^①他采用的是社会学观察方法，而这种方式也是上海英文外报报道中国经常采用的方式。譬如，从中国人与其同胞的关系这个维度进行考察，在华英文外报发现大多数中国人“缺乏公共精神”，中国城乡道路交通，就是中国人缺乏公共精神的典型例证，而这个问题在上海表现得尤为突出。总的来看，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英文外报里，“中国国民性”作为一种大众媒介建构的图景显得丰富多彩。报道者将“中国国民性”置于城市与乡村具体场景中，

^① [美]明恩溥. 中国的真实状况和需求. 中国人的气质[M]. 刘文飞, 刘晓阳,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多维度地呈现中国人共有的性格特质。

（一）公共意识的缺失

太平天国时期，上海租界为不被战火燃及的“保护区”，江浙等省难民纷纷涌入租界避难，租界华人很快超过外侨人口。人口的增多，自然导致公共交通压力增大。以英美租界为例，1865年前后已修建26条租界内的主干道路，以后又以主干道路为基础，建成租界交通网络，但仍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①有意味的是，上海英文外报避而不谈交通秩序管理混乱的问题，其报道更多关注租界华人的公共意识问题，认为华人公共意识的缺失就是造成交通拥挤与公共秩序混乱的顽疾。当时，租界中有马车、轿子、人力车、独轮小车等交通工具，英文外报经常报道华人爱面子、讲排场，耻于步行和坐独轮车等现象；报道中的中国车夫不按照租界交通要求出行，自由散漫地行驶在道路中央；有身份的华人乘坐多人抬的轿子，旁若无人地占据道路，导致其他速度较快的车辆常常受阻，还不顾及租界内交通规则；华人车夫总是忙着看路边漂亮的女人，不管是否出现冲撞行人的危险。^②《字林西报》曾刊登一位读者的来信说，一天他经过虹口，一辆人力车急速从身边冲过去，撞伤一个保姆，还差一点儿撞倒儿童。^③还有一位读者反映，仅两天时间，他就见到6辆人力车冲撞行人。^④租界里的手推车众多，造成交通阻塞，也成为上海英文外报报道、评论的视点。有读者认为，人力车夫生活苦，收入低，老人和子女都需要赡养，值得同情；他们不懂得城市的生活规则，但可以进行教育改造。^⑤交通拥挤的根本问题在哪里？多数人认为，根源不在于租界的交通管理，而在于中国人缺乏公共意识，漠视交通规则。最好的方案是教育华人，以加快华人适应都

① 熊月之. 历史上的上海形象散论 [J]. 史林, 1996, (3).

② 中国的车夫 [N].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878-01-29.

③ 危险的道路 [N].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878-09-20.

④ *Shanghai Courier and China Gazette*, 1878-09-18.

⑤ 手推车的双倍税 [N].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877-06-07.

市生活的步伐。^①

城市如此，而在广大的中国乡村地区，外报媒介视野里的华人更缺乏“公共意识”。1889年2月8日，《字林西报》刊登美国传教士明恩溥的文章，此文指出，“中国的一般百姓觉得只求自己的财产不受损失，而都对社会公共财产无责任心”。^②他认为，对公共事业漠不关心导致社会公共设施不断遭到破坏，“所有那些没人看管的公共财产，都成了百姓们盗窃的目标。不少铺路石头被人搬回家，城墙上的砖头也常常莫名其妙地消失。曾经有一座外国人建的公墓，由于没人看管，公墓围墙砖头被百姓拆得一块也不剩”。^③作者认为，这不仅反映出中国人“公共意识”的缺失，道德素质也在不断下降。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字林西报》《上海文汇报》《晋源西报》等英文报纸相继开辟“读者之声”栏目，鼓励读者反映上海租界社会矛盾，表达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并鼓励开展对问题的讨论。以1876—1879年的《字林西报》《晋源西报》为个案，近4年时间里，两种报纸先后刊载读者来信200多封，超过三分之一的“读者来信”反映租界华人无视公共交通秩序、不讲社会公德的行为，“中国人似乎习惯于大喊大叫地发出命令和评论，这种坏习惯是根深蒂固的”“不少中国人遇到生气的事情大喊大叫，遇到非常激动的时候，总像狗一样狂吠一阵”。^④租界是华洋杂居之地，其中华人居多，噪声扰民问题常常成为英文外报报道和评论的新闻点。有作者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抱怨华人商铺一刻不停地营业，常常到深夜也不关门，叫卖声不断，吵得老人不能入眠。苦力半夜打架骂人，天还没有亮，垃圾车辆的隆隆声、人力车夫和手推车夫号叫着争抢生意，时常把人们从睡梦里吵醒。作者指责租界工部局：“难道要把租界变成中国的县城吗？”^⑤

① 交通规则 [N].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877-06-07; 交通安全 [N]. *The Shanghai Mercury*, 1879-08-02.

② The Absence of Public Abence [N].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889-02-08.

③ The Absence of Public Abence [N].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889-02-08.

④ [美]明恩溥. 社会台风. 中国人的气质 [M]. 刘文飞, 刘晓旻,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194.

⑤ 街头的噪音 [N].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878-01-26.

中国人为什么缺少“公共意识”、缺乏社会公德？明恩溥认为，是中国人的道德素质在下降。他发现，《诗经·小雅·大田》有“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的诗句。^①在周朝鼎盛时期，那时的中国人先公后私，即便是老天下雨，也希望雨水先要降在公田。但如果在当今，都不希望雨水先降至公田里。^②事实上，这样就把问题简单化了。当时的中国人缺乏公共精神，一方面缘于基于小农经济基础的中国社会发展滞后，另一方面，封建专制土壤难以产生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公民意识”，“公共精神”与“社会公德”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形成的价值规则和行为规范。相对而言，当时西方国家已步入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制度赋予了应有的公民权利，人们自然产生公共意识和遵守公共秩序的习惯。而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农业社会的松散、无组织性等，不可能让他们产生近代社会的“公共意识”。特别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基础千年不变，“公共精神”也不可能凭空生发；而在当时华洋杂居的租界，农业社会成员的社会习性、人格心理都需要与环境磨合，短时间内难以重塑人格，适应近代社会规范。

（二）冷漠、残忍、无同情心

中国人如何对待自然生命，如何对待身边的同胞，这是上海英文外报经常谈论的话题。在上海英文外报中，中国人被描述为冷漠残忍的族类：不尊重生命、缺乏同情心。租界西侨喜欢养狗，有些狗丢了，成为野狗，常常遭路人追打，为此引起一些西侨的不满。1878年2月26日出版的《字林西报》发表《偷狗》一文，作者说，“狗是人类最有价值、最值得信赖的朋友”，没想到这些“人类的朋友”遭到残害，那些狗被人剥皮抽筋，这样被中国人吃掉了。1878年7月4日，《字林西报》发表《重要的话》，作者叙述：“租界中的华人警察打死了一条野狗，被一位中国男孩捡走了，看来成为一顿美餐。”在西方人看来，吃狗是残忍的，只有华人才能做出来，这是一种很不文明的行为。当时，租界的辐重用牛马运送。西人发现，中

①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889-02-08.

②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889-02-08.

国车夫把牛马当成无生命的工具。1878年4月2日,《晋源西报》发表《虐待牲畜》一文,作者指出,那些拉水车,在没有载水的时候都很沉重,而装满水之后,车夫偏要坐在车辕上,拉车马不堪重负,累倒在路上;作者还指出,虐待牲畜的现象非常普遍,他常见肥胖的中国车夫,坐在超载的马车上挥舞着鞭子,马的头部和颈部被磨伤,鲜血直流。^①之后,《晋源西报》连续发表评论,批评中国人虐待牲畜的行为。

中国人对待牲畜毫无同情之心,对待自己的同胞会如何呢?华人的麻木、冷漠、缺乏仁慈,成了上海英文外报的媒介景观。1889年5月8日,《字林西报》刊发《同情心缺失》一文,列举了中国人缺乏同情心的表现。

一是对残疾人和老幼病人的态度。作者发现,中国人把有生理缺陷的人看成邪恶的化身,“正常人都应该避而远之”,残疾人生理上的缺陷是因为他们的罪孽遭到了报应,残疾也会导致心理变态。他还发现,“那些残疾人,总会不断地被人提到他们的缺陷,中国人常用别人的缺陷称呼别人”。^②一般家庭对患病儿童和危重病人也缺少同情心,譬如对夭折的孩子通常不掩埋,把孩子的尸体放在乱坟岗上让野狗吃掉,防止死者变成“鬼”纠缠家人。二是虐待妇女。在广大的乡村,新人结婚时,人们以虐待新娘为乐,“把草籽谷糠之类的东西撒在新娘的身上取乐。新娘就像刚刚买回来的马一样,成了众人品头论足的对象”,这说明他们对新娘的人格缺乏起码的尊重。女儿一旦嫁人,婆家可任意打骂媳妇,“所有的中国女孩子相当长一段时光都在婆婆的控制之下”。^③三是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得不到法律保护。一旦遇到灾荒,妇女和儿童就像牲畜一样被随意拍卖,譬如1878年的那场饥荒,“大路上,车辆络绎不绝,车上满载着被卖的妇女和孩子”。^④四是对生命的冷漠。作者指出,扶危济困鲜见,甚至“众人会对落水者袖手旁观”:一艘外国船起火了,中国人站在岸上围观而不去施救;暴风雪席卷山东的寒冷之夜,山东潍县一家客栈的店主不让冻得半死的路

① 虐待牲畜 [N]. *The Shanghai Mercury*, 1877-08-08.

② The Absence of Sympathy [N].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889-05-08.

③ The Absence of Sympathy [N].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889-05-08.

④ The Absence of Sympathy [N].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889-05-08.

人进门。^① 作者指出，令人惊骇的是那些残酷的刑罚：许多通奸“犯人”遭受私刑；因偷盗、叛乱被处死的人很多，处死的方式异常残酷，譬如砍杀、凌迟、活埋等。在私塾，先生常常毒打学生。一位地方官员为了得到钱财，敲诈新入狱的囚犯，这两个犯人各挨 300 大板，被打得皮开肉绽。

中国人为什么缺少同情心？作者把问题归结于中国贫困。因为生存艰难，人们为获得生存资料而进行残酷的斗争，使中国人承受令人难以想象的苦难，以致对苦难麻木，造成心灵的缺陷。那么，应该如何改造中国人的心灵状态？作者从传教士的立场出发，把中国人看成心灵停滞的“异教徒”，指出“让基督教影响中国人，形成培育中国人心灵的土壤，最终会让心灵开花结果，接近上帝”。^②

（三）“演戏”：人人不说真话，也不相信真话

在解剖中国国民性问题方面，《字林西报》的媒介话语最有代表性。该报曾发表文章指出，无论在日常交往还是在政治生活中，中国人善于“演戏”，以骗取社会承认，获得某些“体面”，因此“戏剧成为了他们的娱乐方式”，这样“在不同场合里，中国人往往把自己当作一个戏剧角色”。^③ 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中国人重“面子”的文化心理和思维定式。中国人讲“体面”，其实质是掩盖动机和事实真相，以得体的方式说漂亮的话。中国人把面子看得很重要，譬如“一位地方官员犯了罪，他一再请求被斩首时允许身着官服，因为要保住面子”。^④ 注重“体面”、习惯于不同场合“演戏”，导致“嘴巴张开，谎言诞生”的喜剧现实。那么，中国人为什么要说谎呢？说谎者是为了获得不说谎就得不到的好处。其恶果非常明显：人人不说真话，“同样也不相信真话”。^⑤ 政治生活就是舞台，“那些不断颁布的告示就是简明的例子，各级官员发布的告示，措辞恰当，包罗万象。其中缺少唯

① The Absence of Sympathy[N].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889-05-08.

② The Absence of Sympathy[N].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889-05-08.

③ Face[N].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888-02-10.

④ Face[N].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888-02-10.

⑤ The Absence in Sincerity [N].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889-08-03.

一的东西——真实！政治家的虚伪言辞似乎是家常便饭，他杀了成千上万的人，却引用孟子这位圣贤的话。他把治理洪水的款项装进了自己的腰包，结果洪水淹没了全省，他却假惺惺地悲叹耕者失去了田地。他与人达成一项协议，他私下里会对朋友说，这只是一个欺骗性的权宜之计”。^①对那些好意帮助他们的外国人，中国人同样猜疑。譬如，“有个外国人去了他不常去的地方，人们会推断他是在考察这个地方的风水。如果他盯着这条河流看，可能在探测这个河流里有没有金子”。对西方人传播的科学与真理，中国人同样怀疑。“有个学者读了丁韪良的《天道溯源》后，仍怀疑地球绕太阳转的学说荒诞不经。”^②如此状态，将对中国的未来贻害无穷。即使改革也不会彻底，其结果就像“泥瓦匠把一个建筑的外墙马马虎虎地糊住”。^③

（四）保守：“中国国民性”的标志性符号

十九世纪的中国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经历两次鸦片战争，中国人意识到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觉醒的上层官僚主张对旧体制进行一些改良。但长期以来形成的天下中心意识，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使多数中国人普遍具有文化保守心理。在上海英文外报的媒介话语中，“保守”已成为“中国国民性”的标志性符号。

1889年2月2日，《字林西报》在“中国国民性”栏目里，一连用3个版面刊登美国传教士明恩溥的文章《保守》，作者列举个人的生活见闻，展现中国人思想保守、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性格特质。他指出，中国人总是把新事物视为异端，接受新事物非经过斗争乃至流血不可。电报最初被引进到中国时，沿海某位巡抚给皇帝上书：当地人对此抱有敌意，以致电报线路无法铺设。然而，“中法战争迫在眉睫，眼看就要挨打，意识到保命要紧，于是就没人反对了。之后各省府迅速建了电报站点”。社会危

① The Absence in Sincerity [N].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889-08-03.

② Mutual Suspicion[N].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889-07-06.

③ Mutual Suspicion[N].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889-07-06.

机加深，急需变革，而中国人因循守旧，甚至在社会变革面前“耍滑头”。原因何在？一位传教士认为，中国人生存的社会基础没有改变，“如果新的社会条件出现，其生活方式也会改善”。^①而几千年来，人们千篇一律地重复单调的劳作，保守习惯源于相同的心理动机，并深深扎根于中华文化心理。十九世纪最后的20年，是中国社会变革的关键期。如果一成不变，就会落后于世界先进的国家。应该说这位生活在中国的传教士敏锐地发现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中存在的问题。

（五）充满矛盾的“国民性”及其被“典型化”

上海英文外报注意将中国专制体制、多神信仰、传统道德，以及社会发展的滞后性等元素融入中国国民性知识话语的生产过程，最终塑造出复杂而又充满矛盾的“中国国民性”知识话语：中国人朴实勤劳而心灵冷漠麻木；生活节俭而近乎吝啬，以致丧失生活的乐趣；重“体面”讲礼节而又虚伪矫饰，善于逢场作戏而又忍辱负重；遵从道德秩序而又盲从权威、缺乏独立思考，充满奴性；仁慈而又残忍；真诚而又相互猜疑；信仰多神而又没有宗教情怀等。总之，“中国国民性”的特征鲜明：阴影与光亮并存，个性元素充满矛盾又能和谐共存。就“中国国民性”的阴影而言，其印象是肮脏、习惯于噪声、拖辫子、溺杀女婴、吸鸦片、歧视妇女、愚昧、自大、盲目排外等。总体上，“中国国民性”被灰暗的色调笼罩，显得怪诞离奇和丑陋不堪。这样的媒介图景已成为西方阐释中国政治野蛮、道德堕落的“佐证”。事实上，作为一种大众媒介的图景，“中国国民性”在生产过程中被娱乐化和漫画化了。譬如：“中国的美女标准，首先要看脚，一种畸形的、挤成一团的只有三英寸长的小脚（中国女子从幼童时就开始用丝带缠足，长大成人后还裹住缠足带，中国美女身上捂脚的气味就可想而知了）。中国佬欣赏女子瘦骨伶仃，身上没有任何线条。我们英国人认为女性美最基本的特征是曲线，而中国佬的美女皮肤黄里泛灰，高颧骨、细小的猪眼，

^① [美]明恩溥. 漠视舒适和便利. 中国人的气质 [M]. 刘文飞, 刘晓晔,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109.

两道眉毛坚硬地横在扁平的鼻子上，拖长成椭圆形，干涩的头发上，抹着臭烘烘的猪油，平贴地梳到头顶上，绾成一个高结，插着银步摇，或者玉簪，有时还有一朵小甘蓝菜大小的人造花。”^① 诸如此类，当“中国国民性”被置于混乱的交通、肮脏的宿舍、无孔不入的噪声等社会场景中，其形象性、鲜活性，加之以新闻叙事所需要的典型细节和典型情节，经过戏剧化处理，趣味性便大为增加，容易得到西方读者的认同，继而激发对“中国国民性”的再想象、再创造和知识话语的再生产。

三、内在逻辑与价值立场

（一）内在逻辑

知识话语生产动机往往是生产者内在思想逻辑的始点。那么，上海英文外报中国国民性知识话语生产的内在动机究竟是什么？

首先，要看到西方在中国的现实需要。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国家试图在中国推进其势力，促使中国“打开国门”。经过两次鸦片战争，西方国家在对华外交、商业贸易、文化活动等方面不断遭遇中国的抵抗。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中国民间抵抗基督教的声音越来越高，不断出现的“教案”表明西方文化无法征服中国。对他们而言，中国既是虚弱的，又是强大的。虚弱是两次战争证明了的，而强大则是中华文化固有的特性。这就像一个解不开的谜团，使西方感到十分困惑。人是现实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国国民性作为中国文化的产物与载体就成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而改造中国文化，就必须深入探究中国国民性。基于此，西方在华外报生产有关中国国民性知识话语就显得十分迫切。法国学者福柯指出，权力并非只作为管束我们的力量出现，而是交织在社会生活中，以产生快乐、知识形

^① China the Chinese, by H. C. Sirtt. Voli pp. 61-62. 转引自周宁. 鸦片帝国 [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4: 169.

式而构成一种话语现实。^①因此，“没有知识不实施权力的，也没有权力不关涉的知识”。即知识建构权力，权力也建构知识。“知识从来与权力不可分，任何权力关系都与特定的知识相关，而任何知识都在创造一种权力关系。”^②

其次，十九世纪的中国历史充满了戏剧性冲突，为在华外报中国国民性知识话语的生产提供了鲜活的材料。西方在华外交官、商人和一般侨民期待中国扩大对西方的开放，以使西方国家在政治、商业贸易等方面获得更多的利益；西方传教士渴望通过“基督福音”的传播，改变中国人的信仰，把“异教国家”变成“基督教国家”。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传教士常借这段历史上出现的事件，谈论中国国民性与儒家文化问题，有意放大中国的阴暗面，夸大儒家文化的缺陷，甚至断言“儒学不能给人民以新生，也不能让中国人过更高尚的生活”。^③他们批评中国儒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将会成为奴役灵魂的思想工具，导致中国人“漠视人性中最深刻的精神真理”。^④这些话语表明，以传教士为代表的“中国国民性”知识话语的生产主体，其动机是以基督教价值冲击中国传统文化，继而在中国确立以西方文化价值为主导的文化秩序。

如上所述，在十九世纪在华英文外报的话语系统中，中国的专制体制、缺乏对上帝的信仰、僵化的传统道德，以及滞后于西方社会发展的现实，最终塑造出复杂的、充满矛盾的“中国国民性”话语。

（二）价值立场

政治倾向、文化背景、利益诉求等因素，决定了英文外报中国国民性知识话语生产的西方价值立场。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英文外报对“中国国民性”的报道不是纯客观的“呈现”。以上分析表明，以大众传媒为平台的生产者的价值立场、利益诉求自始至终地渗透在生产与传播过程中，无

① Power/Knowledge, by M. Foucault, M. Brighton: Harvester. 1980, pp. 119. 转引自周宁. 鸦片帝国 [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4: 107.

② 周宁. 鸦片帝国 [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4: 111.

③ Polytheism, Pantheism, Atheism[N].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888-10-04.

④ Polytheism, Pantheism, Atheism[N].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888-10-04.

法原生态地呈现中国国民性媒介图景。大众媒体所报道的“中国国民性”，很大程度上是西方观察者主观化的一种“媒介景观”，其中蕴含着西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立场。

首先，无论是编辑还是作者，其本身都无法超越西方的观察立场，也无法超越自身活动的局限。在情感心理层面，他们对中国有一种天然的距离感：“中国社会就像在中国随处见到的一些风景，只要与它保持一点的距离，它表面上就显得非常美丽、魅力无穷。但如果走进这些风景，你就发现一些残破不堪、令人厌恶的东西，连空气中也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味道。尽管在西方摄影技术被称为‘不带情感倾向的客观和公正’，我可以这样说，没有一张照片能公正地再现中国的风景，因为在中国的摄影就不是这样，肮脏和臭味常常被摄影家忽略了。”^①这样的心理和认知，自然影响他们的新闻选择以及观察问题的视角与方法：“中国国民性这个话题涉及的范围如此之广，许多话题就不能不省略掉，选择出来的加以讨论的材料也不过是一个点，最后把这些点连为线条，或许可以描绘出中国国民性的基本轮廓。”

其次，“中国国民性”作为一种媒介话语，报纸本身的立场、倾向，决定了传播过程中的话语选择，决定了传播者采用何种话题，以及用什么样的材料来建构中国国民性。这样，编辑对大量的文本必须有所筛选和删减，报纸刊登出来的稿件不可能再是原稿，所删除的材料，往往是“与公众利益无关的内容”。^②现存报刊资料中，偶尔也能找到编辑选择、删除稿件内容的说明，虽然刊登了一些稿件，但编辑并不赞同作者的观点。^③因此，在英文外报的媒介话语系统中，“国民性”不是一个普通的言语符号，而是“文明”的一种标杆。在华外报有意神化西方近代以来的科技进步、政治文明和经济发展。而相比之下，中国是停滞的、半野蛮的，因此需要西方的启蒙与拯救。而这种所谓的启蒙思想，不仅塑造了色调阴郁的“中国

① [美]明恩溥. 中国的真实状况和需求. 中国人的气质[M]. 刘文飞, 刘晓旸,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② *The Shanghai Mercury*, 1879-07-14.

③ *The Shanghai Mercury*, 1877-07-28.

国民性”图景，同时也塑造出社会发展停滞、民族文化保守，并与西方社会形成鲜明对比的中国形象。

那么，如何改造中国国民性？英文外报常常撇开中国的文化背景，夸大基督教对人的灵魂救赎作用。在英文外报的媒介话语中，中国是一个没有真正信仰的“异教国家”，从发表的文章看，多数倾向于向中国直接传播“基督福音”，推进中国基督教化。1890年10月4日，《字林西报》发表《多神论、泛神论和无神论》，作者批评儒学缺乏终极关怀，阻碍中国人与上帝的精神交流，以至于中国人把所崇拜的神灵建立在假设之上，缺乏真正的灵魂层面的信仰。因此，“儒学不能给人以新生”^①，只有基督教文化才能救赎中国，正如明恩溥所言，“用基督教文明疗治中国人的缺陷是一个很好的方案”，因为“基督教最美好的产物，就在于它创造了美好的人生，这种美好的人生从不少见”。^②基于此，英文外报所生产的“中国国民性”话语，以及由此塑造的停滞、落后、半野蛮的中国形象，不免带有一种明显的动机，那就是借助中国国民性话语的生产与传播，以证明西方文化宰制中国的某种“合理性”。因此，在华外报生产知识话语的过程，既是赋予西方改造中国“合理”内涵的过程，同时也是建构西方“文化霸权”地位的过程。

四、结语：中国国民性知识话语的影响

十九世纪在华英文外报生产的中国国民性话语，逐渐成为现代西方中国形象的一种知识来源。当代美国学者哈罗德·伊萨克斯曾以问卷的形式，调查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是：无扩张性、无生气、屈从奴性，消极地接受新事物，疾病，乞丐，瘦骨嶙峋的儿童，缺乏温饱，文盲、无知、迷信、神经麻木等。值得思考的是，这些被调查

① Polytheism, Pantheism, Atheism[N].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888-10-04.

② [美]明恩溥. 中国人的性格 [M]. 乐爱国, 张华玉, 译. 北京: 学苑出版社, 1998: 284.

者中，绝大多数没到过中国，其知识来源多是大众传媒对中国的报道和一些有关的出版物。作者还提到明恩溥 1894 年出版的《中国人的气质》一书，称中国人有顽强忍受艰苦工作和单调工作的能力，在世界其他民族中很少见。^① 美国人何以形成有关中国人的印象？这位学者通过研究，发现西方大众传媒是美国人接受有关中国知识的主要途径。^②

十九世纪英文外报生产的“中国国民性”知识话语，也曾吸引中国知识界的关注，为清末民初的文化改造运动提供了知识资源。以明恩溥在《字林西报》的连载和以后结集出版的《中国人的气质》为例，其影响可见一斑。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惨遭保守派的屠戮，梁启超不久流亡到日本。《中国人的气质》日译本发行时，梁启超正在日本主编《清议报》《新民丛报》。1902 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一连多期，发表长篇论文《新民说》，称“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他指出，“我国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③。中国何以自救？在梁启超看来，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国民的公德建设至关重要，梁启超的这种观点明显受到了明恩溥的影响。同年，梁启超发表《新民议》一文指出，“欲探求我国民腐败堕落之根源，而以他国所以发达进步者比较之，使国民知其受病所在，以自警厉自策进”^④，此中话语可见其思想受到《中国人的气质》一书的启发。1903 年 3 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 27 号）上介绍《中国人的气质》一书，称此书“在美国重印一千百五十次”，欧美人欲了解中国，必阅读此书。同年，成为著名教育家的马君武在《政法学报》上发表《论公德》，文章中引述明恩溥有关中国人缺乏公共意识和社会公德的文字，提出要改造现实中国，须从改变中国人的习惯入手，使国民树立公德意识。20 世纪初中国新文化运

① [美] 哈罗德·伊萨克斯·美国的 中国形象 [M]. 于殿利, 陆晔, 译. 北京: 时事出版社, 1999: 130-134.

② [美] M. G. 马森·西方的中华帝国观 [M]. 杨德山, 译. 北京: 时事出版社, 1999: 65.

③ 王德峰, 编选. 国性与民德: 梁启超文选 [M].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5: 46-47.

④ 王德峰, 编选. 国性与民德: 梁启超文选 [M].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5: 38.

动及其展开的文学革命，就是以“改造民族灵魂”为根本任务，文学革命主将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就接触到日译本的《中国人的气质》。早年鲁迅与同学许寿裳经常讨论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①其思考一直贯穿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的主题演变之中。鲁迅在他的小说里塑造了闰土、祥林嫂、阿Q等中国社会的典型人物，实际上贯彻了“国民性改造”思想。鲁迅的杂文主题也以一贯之，如批判中国人的瞒和骗、冷漠、看客心理、说谎、重面子、逃避现实、喜欢“做戏”等。由此可见，作为“他者”生产的“中国国民性”知识话语，其思想一旦传播到中国特定的环境，再经过中国特定阶段知识主体的选择与融化，很快转化为中国启蒙与救亡、民族复兴的思想资源，这恐怕是“他者”始料未及的。

作者简介

谢庆立，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

本文原载于《新闻爱好者》2021年第2期。

^① 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等.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8-9.